

“月港、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 全球化初期太平洋航路港市考古新进展” 国际学术工作坊综述

◆ 吴春明

(厦门大学海洋考古学研究中心)

◆ 刘 淼

16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西班牙航海家建立并经营分别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与菲律宾马尼拉之间的跨北太平洋海路为主体的“马尼拉帆船(Manila galleons)航线”,这一持续250多年的“新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航海史上的创举,将东亚与美洲、欧洲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欧洲海洋势力东突西进、实现东西方早期贸易与全球化格局的重要一环。

沉船遗存与港口史迹是“马尼拉帆船航路”是考古学调查、研究的两个主要对象,欧、美及东南亚的海洋考古学界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2013年厦门大学海洋考古学中心与哈佛燕京学社联合举办了“亚太海域早期航海史的考古学探索”国际学术工作坊,来自中国、菲律宾、英国、墨西哥和美国加州、德州、麻省的海洋考古学者三十余人,聚焦“马尼拉帆船”及相关的沉船考古发现,重建东亚北美早期航海与贸易史(参见会议文集《亚洲太平洋早期航海:海洋考古学观察》,斯普林格出版社2016年英文版)。

为进一步扩展这个课题的广度和深度,2017年7月21-23日,厦门大学海洋考古学研究中心再次组织以“月港、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全球化初期太平洋航路(16-19世纪)港市考古新进展”主题的

学术工作坊,诚邀“马尼拉帆船航路”相关港市的考古工作者与会,聚焦16-18世纪以华南海澄月港、澳门、日本长崎、菲律宾马尼拉、关岛阿加尼亚(Hagatna)、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圣布拉斯(San Blas)等)的港市考古发现,通过大帆船沿线各国港市考古资料的交流与比较研究,从港市考古角度深化“新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并形成一部港市考古视角下的泛太平洋早期航路史新著。

本次工作坊依“从月港到阿卡普尔科”的航路空间顺序,分别安排“出入月港”、“马尼拉集散”、“驶向阿卡普尔科”三个交流与研讨环节,涉及相关港市考古新发现、相关港市航海史与贸易史、相关港市的聚落景观与社会人文、相关港市的腹地经济与市场辐射等。

一、出入月港——闽粤沿海的马尼拉航路历史与考古

闽南九龙江入海口的月港兴起于明代早中期的私商贸易,崛起于“隆庆开海”(隆庆元年,1567年),是五百年来海洋全球化背景下、西班牙“马尼拉帆船”泛太平洋航海贸易拉动的结果,是东亚大陆沟通世界的重要窗口。多篇论文涉及月港及其港湾海洋

史迹的调查与研究、月港腹地外销瓷考古、月港始发沉船、月港输入舶来品的文化史分析等。

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姜波《港市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一文,从宏观全局角度,阐述了港市考古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他认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港口、沉船和贸易品是解读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遗存,而尤以港口遗迹最具代表性。古代海港城市一般选址于河流入海口,这样对内可以依托内河航运形成的贸易网络,对外便于接驳海洋贸易体系,同时还可以规避的海洋风暴和海盗袭击。近年来学术界对泉州港和漳州月港遗址的考古调查发现,为适应海洋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内陆城市的海港城市形态,我们称之为“海港模式”,它包括一系列的考古遗存,如:市舶司、码头、航标塔、港市、祭祀设施、仓储设施、渠运设施、窑址、海防设施等等,都是不同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以海港为联接点,由不同族群主导的海上贸易形成了自成一体的贸易网络。海港遗址出土的舶来品成为探究海上丝绸之路古代族群、语言和宗教的交流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考古遗存。海港遗迹突出地体现了古代文明交流与对话的遗产价值。如泉州港的开元寺(佛教)、真武庙(道教)、天后宫(妈祖)、清净寺、摩尼寺以及印度教、景教遗迹,生动展示了作为国际贸易港口城市宗教文化的多样性。

厦门大学吴春明《马尼拉帆船船货主要来源港的月港历史及相关史迹》,阐述了月港作为区域性与全球性海洋史、航海史相互作用的兴衰演进,以及相关的港口史迹调查进展。他认为,月港既作为闽中海洋文化与航海、港市内在传承、更迭的一个环节,又作为16世纪以来欧洲航海家主导的环球航路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延伸的一个码头,明代中晚期以漳州月港(太武、浯屿、大担及相邻的料罗、南澳等海域放洋)往返吕宋为主线的东洋航路网的发达,与同时期欧洲洋船东进、全球化海洋贸易的拉动密不可分,尤其是以马尼拉为中心的西班牙泛太平洋航路,给月港的走私贸易提供了最重要的海外市场。

最初经由月港输入的西班牙殖民地银币,是月港港市文化遗产的特殊内容。厦门大学刘焱《考古看明清时期西属殖民地银币的传入与扩散》,系统整理研究了月港、闽南及东南亚沿海发现的16-18世纪西班牙各殖民地银币的内涵、类型与年代,并分析相关的贸易史。她认为,新航路开辟之后葡、西、荷、英等西方殖民势力陆续到达东亚海域,并以澳门、马尼拉、巴达维亚、台湾等为中心进行跨洲洋的转口贸易,将中国市场卷入早期全球贸易网络之中。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东南亚的香料、印度的纺织品、墨西

哥等地为代表的西属银元及日本银元等都成为这一时期全球贸易中重要的物资及媒介。西属美洲白银大量输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并最终在民间广泛流通和使用,对中国的经济和货币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陆续发现属于16-18世纪的早期西班牙所属殖民地银币(简称“西班牙银币”)窖藏,就是这段重要海洋交通史的见证。

清初开海及闽海关由漳迁厦,清朝开放了西班牙马尼拉帆船靠岸厦门贸易,成为月港的自然延伸。福建博物院王芳《厦门鼓浪屿十八世纪西班牙海商墓》,则披露了月港—厦门港市考古的重要发现,揭示了马尼拉帆船靠泊厦门港的一段重要历史。厦门鼓浪屿田尾路8号的山坡上残存一块十八世纪中叶西班牙海商墓碑,原墓已毁。该西班牙文墓碑铭记了1759年埋葬于此的西班牙马尼拉大帆船“瓜达卢佩圣母(SE?(O)RA. DE GUADALUPE)”号船员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卡里阿索(MANUEL DE ZESPEDESY CARRIAZO),死者年仅30岁。曼努埃尔出生于1730年3月11日的西班牙布尔戈斯,笔者查证到了曼努埃尔出生6天后即1730年3月17日在巴尔塞尼亚斯-德里维罗教区的洗礼记录,了解到他的父母及祖父、外祖父家世。十八世纪西班牙海商曼努埃尔墓碑的发现是厦门曾经作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重要口岸的实物证据,与清周凯《厦门志》所记“厦门贩洋船船只,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盛于乾隆初年(1736年)。时有各省洋船载货入口,倚行贸易征税,并准吕宋等夷船入口交易”吻合,说明清初西班牙大帆船已经准许入境厦门贸易,这与明代月港华商垄断华南与马尼拉间的海洋贸易情形已有不同,改变了月港—马尼拉航路上华商的垄断地位。

厦门大学刘焱的《月港输出漳州窑瓷器的类型与内涵》,则系统概述了主要因月港—马尼拉航路而兴起的漳州窑瓷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她认为,漳州窑的兴烧与明代晚期海外市场的变迁有关,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陆续到达东亚海域后,特别是西班牙海商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帆船贸易逐渐形成后,漳州月港成为其输送美欧船货贸易供应的主要来源地。明代晚期随着漳州月港的兴起,福建的青花制造业在明末清初以漳州窑系为中心迅速发展,月港附近以平和、南靖、广东饶平为生产中心的制瓷业兴起,以平和县分布最多、最集中。相对于景德镇产品来说,漳州窑产品要粗率的多,漳州窑在万历年间景德镇民窑因原料的匮乏而危机之时作为景德镇外销瓷器的补充。通过葡萄牙、西班牙贸易销往欧洲的瓷器以景德镇所产优质瓷器为主,质量较

粗的漳州窑产品则主要用于葡萄牙、荷兰等在亚洲的转口贸易及葡、西、荷在各地的殖民地使用。

广东南澳一号沉船是一处比较明确的月港-马尼拉航路商船沉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周春水《广东南澳一号沉船考古发现》系统地论述了该沉船考古的重要发现及其在中西贸易史上的地位。该号沉船三年的水下考古，共出水文物总计 2.7 万多件，类型丰富，既有占大多数的陶瓷器，也有数量不菲的铁器、铜器、锡器等金属器，还有少量石器、骨器、漆木器等。瓷器在出水器物中占到绝大多数，数量达 2.5 万件以上，主要来自于福建漳州窑系和景德镇窑系。经实地考察与资料比对，漳州窑系瓷器来自于漳州平和五寨二垅窑，景德镇窑系的瓷器来自于景德镇观音阁遗址。南澳沉船瓷器更接近或稍早于 1600 年“圣迭戈”号沉船所见的漳州窑青花瓷，明显比 1613 年“白狮”号沉船所见的漳州窑青花开光瓷年代更早，年代为明万历前期。他认为，南澳沉船始发港口推断为漳州月港，是隆庆开海之后一条海商贸易船，其海外第一站最有可能是菲律宾，与西班牙人进行交易，并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运往西属美洲殖民地销售，最后辗转至欧州市场。南澳一号的货物不同于以前销往西方上层贵族使用的精美瓷器，揭示出航海时代全球化来临后，大宗货物的外销模式，描绘了十六世纪末中西商贸初始的交易情形。

月港不但是马尼拉帆船船货的主要来源地，一度更是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一系列物产与物质文化传入影响中国的主要窗口，厦门大学吴春明《“马尼拉帆船”舶来品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对此做了全面的阐述。该文认为，在明代海禁与朝贡贸易背景下兴起的私商月港，在西班牙海商止步东亚岛屿带的困局下，“嗜利通番”，接驳马尼拉帆船，成为东亚大陆连接全球贸易的重要窗口，是马尼拉帆船带来美欧新物产、技术与文化的主要输入门户。月港输入的这些舶来品，极大地改变了近古中国的社会景观与生活内涵，大大地丰富了中华多元文化的内涵，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特殊的贡献。比如，原产美洲的番薯、橄榄、马铃薯、玉米、西红柿、落花生、烟草等物种，经由马尼拉帆船引种到菲律宾，被月港海商带回中国并迅速扩散，丰富与改善了中华农耕与饮食文化的结构。白银、武器装备等欧美工商器物经西班牙泛太平洋航路运抵马尼拉，经月港海商接驳进入华南及中国内地，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我国传统工商业内涵的更新与进步。而闽粤之间的漳泉红砖建筑群，是中国传统民居中非常特殊的一环，其外显特征与从地中海到波斯湾沿岸，并伴随着欧洲移民的步伐红遍美洲大陆的罗马、拜占庭与

伊斯兰建筑融合的红砖建筑文化一致，这与月港-马尼拉航路的贸易轨迹同步。

二、马尼拉集散——澳门、台湾、长崎、马尼拉的大帆船贸易遗存

十六世纪以来，东亚沿海各国在相继与西方海洋接触中，逐步有限度地限口开放通商。世纪 1521 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收西班牙国王之命首次环球航行中先后抵达包括关岛在内的马里亚纳群岛、菲律宾萨马岛等，奠定了后续二百五十余年西班牙太平洋航路的基础。1557 年，葡萄牙租借澳门，1567 年月港开海，1570 年日本长崎也开放西方贸易，1571 年西班牙征服了菲律宾土著并在马尼拉港建立起他们在远东贸易、航运基地，1626 年西班牙短暂占据台湾鸡笼。马尼拉是西班牙太平洋贸易航路西端的总集散地，澳门、长崎等成为月港之外马尼拉帆船的接驳口岸。来自我国香港、台湾及日本、菲律宾的学者，分别报告了上述港市的西班牙贸易遗存的调查与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王冠宇阐述了《马尼拉帆船贸易陶瓷的类型与产销地》。文章指出，16 世纪以来，中国丰富的物产，工艺精湛的日用品及艺术品，在早期全球化的进程中迅速得到更广阔市场的喜爱与追逐，作为佼佼者的中国瓷器，成为热销的国际商品。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乃至后来的英法等商人，都曾积极参与中国瓷器的设计、生产、运输和销售等一系列环节，以获取巨额的商业利益。多元的推动者及其背后目标市场需求的不同，使得明清时期中国外销瓷器的产地、类型及装饰风格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这些瓷器面貌的差异，也成为我们探讨其背后历史及产销动因的重要线索。因此，文章拟以晚明时期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为例，剖析其货物中不同产地、不同类型及不同装饰风格陶瓷的构成与组合，及其背后所反映的，西班牙海上帝国版图中特定的市场需求。

台南艺术大学的卢泰康以《澳门、台湾发现的克拉克瓷与大帆船贸易》，以“克拉克瓷”为焦点，探讨台湾与澳门所发现的克拉克贸易瓷，及其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具体联系。论文阐述了十七世纪前半荷兰 VOC 在澎湖（1622 年-1624 年）与台湾南部（1624 年-1661 年）的陶瓷转口贸易，以及上述地区所发现的中國克拉克瓷，讨论了西班牙占领台湾北部短暂期间（1626 年-1642 年）的贸易活动及其出土文物，也说明澳门所发现的中國贸易瓷与克拉克瓷，最后还介绍台湾出土的十七世纪后半克拉克风格日本肥前瓷器，藉以探讨台湾郑氏所经营的陶瓷转口

貿易,透過馬尼拉與橫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航線,轉口銷售亞洲貿易陶瓷。這些不同區域的重要發現,清楚地揭示了十七世紀東亞、東南亞,甚至橫跨太平洋所形成的複雜物質貿易交流網絡,以及多邊文化交流與互動。

日本科學促進會的 Etsuko Miyata《日本長崎發現的大帆船貿易陶瓷》一文,著重研究在長崎考古發現的貿易瓷器。通過出土陶瓷的類型、數量以及復原器物的研究,與馬尼拉帆船貿易興盛時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墨西哥陶瓷相比較,以證明長崎作為一個貿易港與太平洋貿易的緊密聯繫。文章還關注作為一個貿易港市的長崎城市文化特點,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長崎這座城市與居住有大量葡萄牙商人的澳門,有著密切的聯繫。長崎也是來自澳門和馬尼拉的傳教士的進入日本的門戶。到了17世紀,日本的人境許可被限制,並且只有中國和荷蘭商人可以進入日本交易。但是,考古發掘出的陶瓷器卻展現了多元文化的影響,長崎成了一個多民族的港口城市。換句話來說,當時的長崎通過來自葡萄牙、中國、西班牙和日本的商人,與所有的亞洲、東南亞和美洲的港口相連,不愧為一個位於遠東的文化大熔爐。

日本東海大學的木村淳則報告了《日本千葉的“舊金山號”沉船(1609年)考古及日本與馬尼拉帆船貿易網絡的關係》,這是一項2016年在日本千葉縣開始的有關馬尼拉帆船“舊金山號”的沉船考古調查計劃。這艘船從馬尼拉出發,原定開往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1609年失事於日本千葉市附近。當時正在船上的西班牙派菲律賓總督Rodrigo de vivero y aberrucia,在沉船事件中幸存了下來並最後成功回到了阿卡普爾科。這次事件也促使德川幕府致力於與西班牙和墨西哥建立直接外交關係,西班牙也正在謀求在日本設立一個馬尼拉帆船的東行航線的停靠港。一般認為“舊金山號”沉沒於現在千葉市的小鎮御宿町附近,現在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舊金山號的具體沉沒位置,也沒有找到任何與其相關的文化遺物。無論如何,對於日本千葉的“舊金山號”沉船考古研究,還應該置於馬尼拉帆船貿易網絡、日本在亞洲的海上貿易中的角色、以及當時的通商口岸管理等角度予以研究。

菲律賓國家博物館 Nida T. Cuevas《菲律賓發現的17世紀福建、日本的陶瓷遺存及與馬尼拉帆船貿易關係》,全面整理研究了菲律賓發現源自華南與日本的太平洋貿易陶瓷,包括的 Fortune Island、那蘇格布、八打雁省和 San Isidro(三描禮士省)的“聖迭哥”號沉船,陸地遺址比如博爾玖恩(宿務省)、PortaVaga(甲米地市)、Mehan Garden、Arroceros Forest park 以及馬尼拉市中市地區也都有發現來自福建的陶瓷。

該文致力於探索福建陶瓷在菲律賓群島中的空間位置分布、分析福建陶瓷陶瓷形態及裝飾特點在空間分布上的差異和規律,以此探討社會精英階層和一般階層的差異,比如馬尼拉市中心區、馬尼拉城外、Arroceros(馬尼拉)、PortaVaga(甲米地市)和博爾玖恩(宿務省南部)等六個地區福建陶瓷的比較研究發現,他們的器物形態與裝飾有明顯的差異。

菲律賓國家博物館 Sheldon Clyde Jagoon)《菲律賓馬尼拉港市考古發現的大帆船貿易遺存》,全面論述菲律賓國家博物館的水下考古研究所在菲律賓水域所做的大帆船貿易沉船遺存,工作區域包括從卡坦端內斯省連接水域(Catanduanes island)到 Embo-cadero(北薩馬省的聖貝納迪諾海峽)和甲米地省。他們通過正規的水下考古調查、勘測技術,對這些可疑沉船地點進行大規模搜索,發現並確定的馬尼拉帆船沉船有聖迭戈號、Nuestra Señora de La Vida 號,並進行了一系列船體研究。

三、駛向阿卡普爾科——美國與墨西哥的大帆船貿易遺存

1521年,麥哲倫登上關島,1565年,關島成為西班牙領土,關島是西班牙大帆船駛向美洲的中途停靠點,大帆船在抵達中美洲的新西班牙港口阿卡普爾科之前,在北美西海岸也留下一系列的重要文化遺產,來自美國、墨西哥的多位海洋考古學者探討了這段重要的航路考古發現。

美國關島文化遺產保護信託 JosephQuinata《關島阿加尼亞城市的发展與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史》,從一個土生土長的阿加尼亞居民的獨特的視角,觀察馬尼拉-阿卡普爾科大帆船貿易的影響,報告了阿扎尼亞的西班牙相關史迹。關島阿加尼亞海灣一直是西班牙在關島的主要港口,阿加尼亞在西班牙人的馬尼拉-阿卡普爾科大帆船貿易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西班牙人在阿加尼亞港市聚落中建造了一系列教堂、總督的官署、堡壘和其他設施,這些建築為大帆船船員和乘客提供各種服務與物資補給。

美國加州白礁(Baja, 1570)沉船是在北美開展的西班牙大帆船沉址最重要的一次考古活動,美國舊金山金銀島博物館 Edward Von der Porter 報告了《美國加州白礁(Baja, 1570)大帆船沉址的國際貿易因素》。自1999年開始,美、墨國的聯合考古隊就開始對美國加州半島的西海岸馬尼拉大帆船沉船遺址的調查,這條船很可能是1578年沉沒的聖朱利奧號(San Juanillo)帆船。該沉船船體、貨物、武器殘骸和船員遺物的研究,使我們詳細了解沉船文物的不同來源及馬尼拉大帆船貿易最初階段的貿易模式。調查

展示了一个丰富的、多样性货物来源,一个典型国际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的沉船。白礁沉船的内涵包括,西班牙和欧洲产的包铁铅片,曾经作为跨太平洋贸易体系中世界货币的西班牙殖民地银币,伊比利亚半岛的陶器,来源印尼并在菲律宾加工的马尼拉大帆船代表性船货蜂蜡,来源于中国装饰龙图案、来源于泰国的 Bang Rachan 和缅甸 Martaban 的马达班陶罐,2666 件瓷器(片)中有 1862 件是中国瓷器并有 123 个不同的类型,包括早期漳州窑瓷器和景德镇瓷器,镶有金属物的中国漆盒,中国铜镜、铜锁板和东南亚火绳枪,以及唯一一枚中国铜钱。我们期待今后再这片沙滩上有更多的“卓有成效的研究”。

阿卡普尔科(Acapulco)是马尼拉帆船航路的西端终点,也是大帆船船货在新西班牙与欧洲贸易传播的起点,墨西哥国家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所 Roberto Junco Sanchez《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圣布拉斯的考古发现》,报告了近年在墨西哥开展的大帆船港口考古发现。墨西哥国家博物馆在阿卡普尔科港圣地亚哥要塞遗址的考古发掘始于 2015 年,这一考古计划旨在研究作为十六世纪以来美洲唯一针对亚洲贸易的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的历史研究,考古工作包括陆地和水上,调查发掘了要塞、教堂、市场、城镇,包括陆上和水的海洋活动遗迹。这些考古遗存和历史文献中重建阿卡普尔科的文化变迁。2016 年起,还在阿卡普尔科城市中心展开发掘,已发现并收集丰富的亚洲陶瓷,墨西哥和英国陶瓷和超过 5000 件(片)的中国陶瓷,代表了从 1565 年马尼拉大帆船早期贸易航路到十九世纪的贸易变迁。同样的考古工作在圣布拉斯港口(San Blas Port)也得以开展,也发现了少量中国陶瓷器,这些器物风格不同但十分有趣,反映了圣布拉斯港口历史在十八世纪从巅峰走向衰落的过程。

贸易陶瓷是大帆船的主要船货,也是遗留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最大量的源自中国文化遗产,墨西哥国家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所 Patricia Fournier 与 Roberto Junco Sanchez 师生二人的合作《墨西哥考古发现的中国陶瓷》,对此做了全面的论述。自 1565 年开创了历时 250 年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跨越太平洋航线以来,新西班牙开始大量进口亚洲商品,如香料、丝绸和瓷器,瓷器成了新西班牙人必备的生活品,甚至当地的陶瓷也开始模仿了中国青花瓷的颜色。文章论述了墨西哥领土范围内迄今考古出土中国陶瓷的分布情况,展示了一幅中国陶瓷在广泛大量分布的画面,许多学者主张中国瓷器曾是新西班牙社会地位的象征。中国产品不仅在城市中心,而且在农村,在偏远地区进行交易。当然,中国瓷器的大部分是在墨西哥城和阿卡普尔科发现的。

中国陶瓷大量输入新西班牙之后,殖民地开始

模仿了中国青花瓷的工艺与形态,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融合形态。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Karime Castillo 与她的老师墨西哥国家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所 Patricia Fournier 合作的《中国陶瓷对墨西哥陶瓷业的影响》,探讨了这一精彩的文化遗产内涵。文章指出,连续两个世纪的马尼拉帆船贸易,将大量东方商品连续不断地往新西班牙,许多商品都作为奢侈品被商路沿线城镇的社会精英阶层买走,这些东方舶来品对新西班牙的手工业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瓷器对于当时的新西班牙社会来说,是制作装饰陶瓷必要的艺术灵感来源之一,对于殖民时期墨西哥制造的装饰陶瓷业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装饰纹样同时作为外观及其象征意义有重要影响。文章分析中国瓷器的装饰是如何被殖民地陶瓷手工艺者所接受,如何被改变并与本土的文化相融合,对新西班牙装饰陶瓷的跨文化交流进行探索,了解这些元素所体现的现代初期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传播,并且强调这些元素中的一些是如何被吸收到当代墨西哥制造的传统装饰陶瓷的核心因素中。

从月港、澳门、长崎到马尼拉,从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在 16 至 19 世纪的二百五十年间,这一跨越太平洋的“新海上丝绸之路”将东亚与美洲、欧洲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影响了欧洲、美洲,也影响了中国,成为近五百年以来海洋全球化不可忽视的一环。在这一航路上广泛分布的多元的考古文化遗产,不但演绎了跨越太平洋的流动的海路历程,还展示了文化多元交互的美好景观。发掘更多美好的海洋故事,太平洋两岸间的考古学国际合作还有很大的潜力。